

张宗祥和《我所知道的鲁迅》



张宗祥(1881—1965)浙江海宁硖石镇人,1902年(清)壬寅科举人。先生思想进步,自废科举后,即以办学为第一要务。早年曾任教育部视学兼京师图书馆主任;1922年后历任浙江省教育厅长,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;解放后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直至1965年病逝。先生毕生从事于古籍校勘和书画研究,为我国近代著名校勘学家、书画家、鉴赏家、学者。先生早年为鲁迅先生挚友,1961年《图书馆》杂志曾作专访,蒙先生欣然命笔为之撰文。关于他与鲁迅先生的关系及他们对我国图书文化事业所作的贡献,从先生所作《我所知道的鲁迅》一文可见一斑。今值先生诞生一百周年,特重新发表该文以资纪念。

——编者

我与鲁迅相识是一九〇九年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。我在师范任教的第二年时,教务长经亨颐要赴日本结业学程,由许寿裳来任教务长,鲁迅和夏丏尊都是许寿裳相约同来的。当时他们住宿师校,我住高等学堂,因此除开会或课余见面闲谈之外,接触时间不多。不久发生了拒绝夏震武的风潮,几个人就比较接近了(此役我曾写过一篇“木瓜之役”登在“东海”中),这一次反对封建奴化教育的斗争曾经惊动了杭州城,其结果是我们胜利了,夏震武辞职。以后杨至绍代理教务长,邀鲁迅继续任教,他始终不允。我亦不久离开了杭州。

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议,鲁迅即由南京赴北京教育部,任职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。一九一三年冬我也入教育部,又得相见。有一次祭孔,我和鲁迅都是执事官,祭毕照例去京师图书馆参观。(那时京师图书馆在大方家胡同,属教育部管理。因为与教育部相距太远,平时不便去,而国子监则就在大方家胡同附近,鲁迅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,主管图书馆,又与我同是喜欢古书的,所以每年祭孔二次,就是我们到图书馆的最好机会。)鲁迅和我正在指着排印的善本书目发议论,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傅增湘悄悄的

进来了,我们也没有留意,不知他听了多少时候,忽然转了出来,大家招呼了一下就散了。隔了两天,傅增湘召我去见,说明要我去办京师图书馆,一切人事可以商量调动,尤须将善本书目编好。我一再辞让,他又招了鲁迅去叫他来敦促我去,鲁迅立即带笑跑来和我说:“你真正是木瓜,如此宝山,何以不去开发?”我说:“好吧,不过有两件重要急事,必须你主管上司帮我忙,能办得通方好,方家胡同四面居民杂处,万一发生火警,无法抢救珍本,我意先做书箱一人能扛的,所有珍本存入箱内以防万一。造新屋是万万不可能的无稽之谈,此其一。许多古籍脱线、残破、裂口、虫蛀,如不大量修补,如何能行,我意须招至少三、四个技工进馆修书,此其二。”鲁迅笑道:“这两件事确是当务之急,那有做不到的。我们来讲馆里的书籍。馆中有十二卷本白棉纸‘说郛’,我看是明初抄本,可惜内容不详,你是‘打字机’(这是当时朋友中送我的徽号,因我一日能写小楷万五六千字),何妨录出大家来研究研究。丛书堂抄本‘嵇康集’,我曾经翻阅过,里边涂去原文另加校改处,大抵根据刻本,反失本真,你能够仔仔细细的照原书抄一下,也是我所急需的。”我说:

“二个月缴卷，丛书堂‘嵇康集’涂改处用墨极浓，不能辨认者，只好将来抄后再参详”。这就是后来印出来的“嵇康集”和鲁迅喜欢研究魏晋文学的初步。关于“嵇康集”当时我也写了一本，觉得有了他一本，我的定本不必再重视，所以一直没有和鲁迅对过，不知与鲁迅印出来的定本有无不同？现在我书已捐献给浙江图书馆了。我后来抄了“说郛”残本，对出陶珏刻本种种误处，又发现“云谷杂记”连武英殿本也少了好几小则，就发心访求各种明抄“说郛”来完成一百卷的原书，后来涵芬楼印过两次，其实是从鲁迅一段闲话中发生出来的。及至我到馆任事之后，书箱也做了，修书技工也请到了。听说现在北京图书馆修书同志还有那时在京师图书馆的呢，想来应该六十多岁了。善本书目告成已在“五四”之后，傅增湘辞职，鲁迅知道我向来写作不留付稿，他屡次对我说：“此目必须录付，私人存一部，因为付印无时，世事变迁不定，必须另录一份，他时方有依据。”我听了他说的话，抄了一份，现在果然屡有变迁，我们当时所抚摩的大内、内阁遗留古籍，多被偷盗出国了。这一善本书目的付本，我也送入浙江图书馆保藏起来了。

辛亥革命后一般人多喜欢研究“红学”，鲁迅和我都是出身破落家庭的穷书生，不大能够领会到绮罗脂粉中尖酸刻薄的描划，而又觉得这个社会应该加以讽刺和揭发，所以趋向于吴敬梓的“儒林外史”。一九一四年一天闲谈，鲁迅说：“我总想把绍兴社会黑暗的一角写出来，可惜不能像吴氏那样写五河县风俗一般的深刻”。又说：“不能写整个的，我就检一点来写”。后来，“阿Q正

传”和“祥林嫂”等文初稿就写成了。我看到“阿Q正传”的开场白“言归正传”等语，笑不可止。我说：“这样文字，恐怕吴先生见了也要退避三舍呢。你究竟写哪个人？”他说：“我是拿三个人结合起来成阿Q一个人的，当然重要成份是一个姓吴的。”自从袁世凯称帝之后，我是钻入校仇、考古中一往不返，鲁迅却自古籍中钻出来，大踏步走上与一切恶魔斗争到底的路上去了。

一九二二年我回浙江，他在北京又有女高师一役战斗。事后来书相告，这一役较“木瓜之役”为大，惜旧时战友，并肩作战的仅季葑（许寿裳）一人。自此之后，我去汉口，他在上海写文章，报纸上时时可以见到他的文章和消息。一九三六年许寿裳忽然来书报告鲁迅死耗，要印一种纪念册，我立刻写了一诗奉寄。鲁迅从此不见了，但他的精神却永远存在着。

诗曰：

老友飘零剩几人 海滨惊报损愁身
文章几度疑戕命 魑魅千年为写真
别有烦冤天莫问 但余慈爱佛相亲
呕心沥血归黄土 天下黔娄识苦辛

原载《图书馆》杂志

1961年第4期



学海泛舟录